

主編的話

天主教身份和社會使命是分不開的。自從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以來，天主教會便清楚地指出其社會使命，即教會是在世界中和服務世界，幫助人明白自己和更新人類社會。¹ 教會希望透過和平、正義、團結、維護人性尊嚴和自由，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² 因此，因著正義、和平和愛而行動，是天主教會和基督徒身份不能或缺的幅度。學習和認識天主教傳統的社會思想和價值，是天主教信仰和倫理培育重要的一環。

天主教社會思想和社會訓導呼籲人向自己和鄰人負責，尋求個人轉化和社會轉變。天主教社會訓導讓我們明白倫理秩序，它鼓勵我們尋求真理和公義，追隨福音精神，令世界變得更人性化。它提供了反省原則、判斷的道德指引，以及基於社會分析而提出解決問題方法的方向。³ 況且，社會訓導的主要原則如維護人性尊嚴、人權、公益和團結等，與普世價值相符，因而讓我們可以與其他善意的人合作。

¹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965，44 節。

² 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梵蒂岡出版社，2004），16-19 節。

³ 若望保祿二世，百年通諭，1991，5 節。

由於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對象多元，因此，它採用了多種思辨模式和方法。當它向天主教徒說話時，它採用明顯的神學或聖經語言；當它的對象是無分宗教傳統的其他懷著善意的人士時，它採用的思辨方法是哲學性、實用和著重人類的共同經驗。以上種種都是基於每個人都享有平等尊嚴的基礎原則。⁴

天主教社會訓導的文件經常強調教育的重要。教會領袖曾指出，社會訓導需要在教理講授和特別聚會、學校和大學中帶出。⁵天主教教育機構有特別角色，讓福音和不同範疇的知識相遇。社會訓導是建設正義、和平和愛必不可少的基督徒教育途徑，亦為不同文化和專業範疇的道德社會責任變得成熟。⁶為了更有效傳達社會訓導的主題和內容，宜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和途徑。

像不少西方國家，奉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香港亦崇尚物質主義和講求競爭，這與天主教價值大相逕庭。在天主教會中，不少信徒屬中產階級或專業人士，當中部分受社會主流價值影響大於信仰的社會價值。與此同時，自九七主權移交以來，愛國主義和國民身份被大力宣揚。小學和中學，包括天主教學校，除了推行公民教育之外，亦被要求推行國民教育。天主教的社會價值又能否融合於國民教育和公民教育之中？

過去，天主教社會訓導常被指為不為大部分天主教徒所認識，更遑論天主教學校的學生。只是近年社會訓導才開始在教區學校以較有系統的方式推廣，堂區卻不然。因此，有需要在不同層面以不同方法推廣天主教社會倫理。

基於此，是時間就如何推行和教授天主教社會倫理和公民教育作進一步探討和交流意見。2017年3月，一群學者匯聚於香港中文大學研討這課題，會議主題是「天主教社會倫理教育和公民教

⁴ Bernard V. Brady, *Essential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8), 18-19.

⁵ 若望保祿二世，平信徒勸諭，60節。

⁶ 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天主教社會訓導彙編，532節。

育」。會議後，基於過程中的討論和同輩評論，參加者修訂他們的論文。這期的天主教研究學報便是這些論文的匯集。

這期刊收錄11篇文章，共分為三部分。作者分別就以下內容作探討：天主教身份和宗教教育；教授天主教社會訓導、社會公義、性別公義和公民教育的方法；香港在推行天主教社會倫理、宗教和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成效的個案研究。

第一部分的主題是**天主教身份和宗教教育**，當中包括三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天主教教育、天主教身份和公民教育：基於天主教倫理教導的選擇性探索〉中，作者Harold D. Horell探討了天主教學校如何一方面立足於天主教身份，另一方面為學生準備成為負責任的社會成員。從兩份教會文件——良十三的《新事》通諭（1891）和若望保祿二世的《真理的光輝》（1993）取得靈感，作者為今日的天主教學校如何培養社會道德／公民責任提出一些建議，例如強調開放和寬容的態度、教導學生在公共空間參與對話式和辯證式的論述，以及邀請學生學習倫理辨別。

第二篇文章是Peta Goldberg的〈跨課程的天主教社會訓導：理論與實踐的啟迪〉。檢視了四位學者對天主教徒身份的主要而複雜的元素後，Goldberg建議將強調人與人（尤其是有急切需要者）之間的關係的天主教社會訓導加入整體課程，學校中的天主教身份可超越宗教教育、禮儀和崇拜的表達方式。以澳洲昆士蘭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等教育機構為例，作者認為，當天主教學校將社會訓導融入整體課程後，學校能把信仰和生命、生活與文化連結起來。透過正規課程，他們為學生提供機會，對當前面對的重大問題作出反省和行動，包括資源分配不均、貧窮、不公義和漠視人權等問題。

在第三篇文章〈英倫和威爾斯的天主教宗教教育〉，John Lydon探討了位於英倫和威爾斯的天主教學校的課程中宗教教育的核心角色，以及背後的「厄瑪烏教學法」。作者亦討論了天主教教師在培育學生方面的重要角色。他們既是信仰的見證人，亦

是學生的榜樣，給予青年希望和啟發。他亦肯定了學校在支持教職員個人和專業發展的關鍵角色。

本期的第二部分是**教授社會倫理和公民教育的方法**，四篇文章的作者探討了在專上學院教授社會倫理和公民教育的不同方法，包括在神學院和大學之中。文章討論了在神學院中有關社會通諭傳統的教育、專業倫理與社會訓導、性別公義培育，以及大學生反省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難題等。

在〈對話和辨別：教授天主教社會正義的創意方法〉一文中，**Marianne Farina**介紹了一個她在美國西岸一間神學院中自己設計的課程，以互動過程來學習和分析社會通諭。課程將社會通諭傳統視為一個辨別模式，用以回應社會正義議題，彰顯在自身處境中閱讀時代徵兆和在福音光照下詮釋有關徵兆的互動過程。這是一個讓各人探索、參與、對話的過程。作者肯定該辨別模式在教會的社會正義使命中的關鍵角色。

為**Stephan Rothlin**來說，天主教社會訓導是讓天主教機構的教育工作者，在面對有關專業教育和倫理的挑戰時，用作更新改革的最佳途徑。在〈專業倫理作為公民教育的訓練〉一文中，**Rothlin**指出，關心社會正義和公平，以及實踐團結關懷和輔助原則（權力下放）的社會訓導，為學生和教授在發展專業倫理的方法上提供了主要元素，特別在正直和誠實方面。他亦指出，建基於靈性和宗教的社會訓導，在公民教育方面作出貢獻，因它超越自由主義模式，而自由主義模式不足以達至大眾公益，因大眾公益要求犧牲和自我約束，確保每一個人的渴望都受到平等尊重。

在〈性別公義教會和社會的倫理培育〉一文中，**Shaji George Kochuthara**建議將性別公義教育視為天主教社會訓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者以位於印度班加羅爾的一間天主教神學院**DVK**中的性別公義培育為例，描述了該項目的特點和當中的科目和研討會。理論加上實踐步驟，該項目提供了一個倫理培育模式，以邁向性別公義教會和社會為目標。

除了天主教機構採用的以上幾種方法之外，來自馬來西亞的 Vishalache Balakrishnan 提供了一個在世俗大學教授公民教育的方法。在〈公民及倫理教育的另類教學法：現實生活中倫理難題的討論〉一文中，作者探討了「現實生活中的倫理難題」教學法，這方法讓學生、教師和社會參與介入社會公民議題，有助於社會參與和轉變，並以全球角度看本土議題。作者認為，該教學法提供了真正的道德和公民參與的機會，並考慮到宗教、文化多元和其他複雜的參與議題。

期刊的第三部分是**香港的宗教、道德及公民教育**，當中四篇文章都是以香港小學和中學的教師和學生為研究對象。在香港主權移交和需要課程改革的背景下，國民身份教育成為教學和學校活動的焦點。然而，道德及國民教育激起爭議，更引發起2012年的大型反國教示威。如何培養公民身份、國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成為教育工作者面對的迫切議題。與此同時，愈來愈多教育工作者意識到，將天主教社會訓導連結到公民及道德教育或宗教教育的重要性。他們亦關心如何實踐出來。基於以上情況，本部分的四篇文章會討論上述議題。

這部分的首兩篇文章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委託的研究暨訓練計劃的成果。第一篇文章是林德成及其教育大學團隊就天主教社會倫理訓練計劃進行的評估研究。在〈教師對天主教社會倫理課程和訓練項目的回應：評估研究〉一文中，作者指出，教師對社會倫理訓練計劃的相關性和實用性持正面態度，對課程支援亦表示滿意。然而，部分教師對投入的努力是否獲得相應成果抱懷疑態度。部分教師提出了一些關注，例如時間限制、如何處理敏感的國教元素、缺乏空間和知識融入課程等。作者指出，無論如何，大部分回應的教師認為社會倫理課程和教材能填補部分現時的道德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中的空白部分。基於教師的回應，為了在現時學校處境中更好地推行相關課程，作者建議採用跨學科方式，以不同主題橫跨各學科，而學生集會和團隊式教授亦可考慮採用。

第二篇文章是謝均才和馮苑菁的〈香港天主教小學教師的多元身份及相關社會價值觀研究〉。作者探討了香港天主教小學教育工作者的多元身份（香港人、中國人、世界公民和基督徒身份）及其來源，以及相關的社會價值觀。基於作者的分析，研究發現，在推行身份教育時，多元身份概念可加入公民身份之中，而一些宗教元素亦可融入於多元身份之中。該宗教元素亦彰顯包容性和與其他價值系統的相容性，因此，宗教元素不只被基督徒接受。作者因而建議可以在學校課程教授社會議題時加入天主教社會訓導作討論。

陳倩盈探討了跨文化學習對香港主流文化群體發展跨文化能力的影響。在〈跨文化教育與世界公民身份的建立：發展跨文化能力〉一文中，作者描述了一個跨文化學習項目在一群香港本地中學生身上的有效性的研究結果。陳倩盈指出，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樣本反映他們未有切合香港多元文化的本質，特別是對少數族裔群體。雖然大部分參加的學生確認尊重其他文化不同人士的重要性，但他們缺乏付之實行的動機。該研究揭示，香港社會存在著偏見、定型的假設，和根深柢固的種族中心主義的態度。因此，作者認為學校在推廣一個更包容的社會上有重要角色。

最後一篇文章是陳乃國和吳穎祺的〈香港天主教學校宗教及道德教育的理想與現實：前線教師的角度〉。作者就前線教師對推行宗教及道德教育的理想與現實情況蒐集意見並作出分析，數據顯示理想與現實兩者之間有相當差距。作者肯定了一些過去的觀察，如欠缺合資格的教師，以及缺乏機制確保宗教及道德教育在學校適當地推行等。他們提出了兩個改善方向，即提升所有教師的能力，特別是宗教倫理科教師，以及設立一個適當的行政系統和機制，讓學校的不同人士都真正參與推廣宗教及道德教育。

如何更有效地推行天主教社會倫理教育和公民教育需要繼續嘗試和探索不同的方法，期望往後有更多教育工作者加入這行列。

阮美賢

2017年10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